



在法治中国进程中讲述“中国好故事”

2025年法治题材电影回眸

□ 李佳

“在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事中间，电影是社会结构中的认知装置，通过放映的方式嵌入社会驱动系统。”2025年第一期《看电影》杂志的卷首语中，写着这样一段话。在潜移默化的社会变革中，在无声无息的时间进程里，电影无疑是重要的参与者：它观察并记录，触碰当下亦回溯往昔，既是认知的外化，又在无形中影响认知。其中，以现实主义为底色，记录并探究现实的影片更是如此，法治题材电影即其中之一。

2025年，法治题材电影延续了近年来的强劲势头，不但有着突出的市场占比，而且佳作频出，在叙事类型、表达方式、情感深度上皆有创新尝试，其中不乏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黑马”，乃至在各大电影节表现不俗的力量。

对接时代脉搏 拓宽叙事范畴

2025年的法治银幕堪称“热闹”。导演陈思诚及其团队最具影响力的IP“唐探”系列，以一部新作跻身“春节档”角逐；在大热的“暑期档”，小成本影片《恶意图》露出“尖尖一角”。大导演冯小刚则以一部《向阳·花》进军法治领域。作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导演陈可辛，他的《酱园弄·悬案》自一年前亮相戛纳后，在2025年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与国内观众见面。“港风”电影也不乏力作，改编自经典影片《跟踪》的《捕风追影》，被誉为“近十年最好的成龙电影”。而因在威尼斯电影节斩获大奖而声名大噪的《日挂中天》，在生活流的表

象下，内核与法治密切相关……

从故事层面来看，这些电影的题材触及面十分广泛，既有偏重传奇性的演绎，也有富于时代的探寻。2025年4月上映的《猎狐·行动》，取材自中国公安机关跨国追逃真实案例，由段奕宏、梁朝伟两大“影帝”领衔对决，呈现了公安部经侦专案组与国际“红通”嫌疑人在金融领域的正邪较量。在犯罪类型的呈现上，既有传统题材的深耕，如《三滴血》中的拐卖儿童、《下一个台风》中的性侵、《大风杀》中的匪匪作乱，《平原上的火焰》中的暴力冲突等，也有新型犯罪的聚焦——继2023年影片《孤注一掷》大获成功后，电信诈骗故事开始在法治题材电影中崭露头角。2025年“国庆档”影片《震耳欲聋》讲的是律师为遭受电信诈骗的弱势群体捍卫权益的故事。影片《恶意图》更将视线投向网络犯罪领域，以一起坠楼事件为引子，呈现了生活幽暗角落如何被网络放大、歪曲，形成谣言扩散进而催生巨大舆论压力的过程，其切口落于“罪与非罪”之间，对现实作出了深刻的警示。相比于这几部电影，《捕风追影》的“步子”迈得更大，直接与AI（人工智能）时代接轨，让AI“联手”大数据加入犯罪与侦查过程，AI侦查分析系统、“天眼”系统、黑客入侵、数字资产窃等高科技元素的融入，不仅提升了影片的叙事质感，让人耳目一新，更为电影叙事与时代接轨提供了成功范例。

突破单一维度 折射人性光谱

近年来，法治题材电影的叙事结构发生了潜在转变，核心在于对单一维度的突破。传

统叙事多强调善恶二元对立，以法律正义得偿、社会秩序回归正轨作为内在驱动力，偏重于完成故事而弱化人物塑造，往往以一到多位“英雄”（正义化身）为叙事核心，最终实现“大圆满”结局。现今多数法治题材电影的故事框架依然延续这一模式，如《唐探1900》《猎狐·行动》《捕风追影》《大风杀》等，皆属此类。“邪不压正”的英雄主义叙事。而2025年的部分法治题材电影，更展现出突破单一维度的探索勇气：它们着力打破传统叙事窠臼，深入挖掘人性内在的复杂光谱，呈现正义的多维面相。通过解构善恶“二分法”，透视正义表层下的多元价值。这些影片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以“多面”人物替代“单面”英雄。在影片《三滴血》中，胡歌饰演的男主人公“驯鹿”，是典型的亦正亦邪、形象复杂的角色——他以接近恶人，甚至同流合污的方式认清恶人，以近似犯罪的手法对抗犯罪，在警方眼中是在逃通缉对象，在拐卖儿童团伙眼中是需时刻提防的威胁。他并非纯粹的“英雄”，拯救目的仅实现一部分，最终与犯罪团伙同归于尽。直至影片结束，这个人物依然耐人寻味。影片《震耳欲聋》的主人公律师李琪，同样拥有“重叠”身份：作为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健听孩子，他既渴望摆脱生长环境困境、追求名利双收，又因成长经历背负着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这种身份冲突让他陷入选择困局，在“保持沉默即可延续事业顺境”与“坚守良心捍卫正义”之间备受撕扯。

其二，以群像人物替代个人英雄。《捕风追影》对经典警匪片《跟踪》的改编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创新——影片改变了正邪双方“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代之以两个“团队”的较量：成龙饰演的老警察带领的“跟踪

团”，与梁家辉饰演的反派培育的“养子团”。随着两个“团队”多维度博弈的展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混战”因章法清晰、技巧娴熟而“乱中有序”，既增加了交锋的层次感，又通过不同人物的性格、特长差异注入偶然因素。更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团队”的情感模式互为映衬，产生碰撞，迸发出引人反思的火花。

拓展人物语境 富时空维度

在2025年法治题材电影中，观众能清晰感受到创作者挖掘人性丰度、触摸人性温度的努力。冰冷的法条，融化在故事背景和细节中，成为主人公自我实现的注解。真正触动人心的，并非必然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人物在荆棘之路上的奋斗，以及驱动他们前行的内在火焰。这些电影以“人物”为核心，通过对选择与行为的细腻刻画，拆解莫测的命运密码。

在法治题材范畴中，电影《向阳·花》《下一个台风》堪称“弱主题”创作——相较于围绕主人公遭遇、环境、互助与抗争的叙述，传统的法治元素似乎仅在其命运“湖心”蜻蜓点水，而真正在深层涌动、形成记忆点的，是人物为生存、尊严、情感乃至自我救赎的抗争，正是这些内核唤起了观众的深切共鸣。影片《日挂中天》更在犯罪、顶罪构筑的故事框架下，触及恩情、救赎等经典母题。影片通过不厌其烦的细节铺陈，展现真切的痛苦，让观众产生同身受的“窒息”体验。当演员章芷兰饰演的曾美云挥出绝望一刀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心中。

“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其选择往往是宏大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的折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治题材电影尝试通过丰富时空维度，拓展人物语境来透视命运，将影片构建为回溯记忆的载体，推演出一代人的独特命运密码。

《平原上的火焰》《大风杀》等影片便重建了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这些作品中，不可阻挡的逝去、无法逆转的变迁和来不及悲伤的告别，构成了繁荣时代的B面，也书写了一代人的命运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主人公的无奈与选择既无足轻重，又不可或缺，既充满能动性，又带着悲怆感。《唐探1900》则沿用了系列前三部的“双男主”结构，将时间线向前延伸一百年。虽然故事推进机制未变，但百年前列强入侵、时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不仅为主人公染上强烈的传奇色彩，更在其选择中注入了民族大义的内涵。而与时代关联最为紧密的《酱园弄·悬案》，其原型是“民国四大奇案”之一。这起看似情节清晰、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放入80年前的时局动荡、思潮汹涌中，宛如一叶小舟在海上飘摇，成为莫测深海的微小注脚。正如导演陈可辛所说：“人是渺小的，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没有时代，都很难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真正“主角”，正是时代与命运。

纵观2025年的法治题材电影，既有对传统叙事的坚守，更有对创新表达的探索。透视角度更趋多元、人性刻画更为丰满，思想内涵更为深刻，情感表达更为丰沛，成为这一年一度法治题材电影创作的鲜明特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成为孕育更多“中国好故事”的丰厚土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年中，电影创作领域的厚积薄发，必将为观众带来更多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数说——五法治题材电影

12亿元

截至2025年11月15日，电影《捕风追影》在中国内地累计票房12.65亿元。

30部

2025年，在中国内地公映的法治题材电影超过30部。

9.6分

2025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电影《控方证人》登陆中国内地银幕，其在豆瓣平台上的评分高达9.6分，足见法治题材电影口碑的巨大空间。

5个方向

纵观2025年法治题材电影，至少包括以下5个方向：悬疑推理、律政司法、警匪动作、新型犯罪、其他（包含诸多法律元素的剧情片）。

12部

公开报道显示，2025年法治题材电影中，至少有12部电影取材自真实事件（案件）。

斑斓影像里的法治深意

对话三位法律学者

主持人：《法治周末》记者
嘉 宾：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尹丽
张建伟
陈碧
蒋海松

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一批法治题材电影接连引发观影热潮。那些直击人心的片段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光影魅力，更传递着深刻的法治理念。我们邀请三位法律学者，从专业视角解码电影画面背后的法治内涵，谈谈银幕光影如何照进法治实践。

解码法治影像

主持人：过去一年，银幕上涌现了不少法治题材或者法律元素丰富的电影作品，其中是否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电影？能否列举一些精彩的情节、画面或人物？作为一位法律学者，如何看待上述作品折射的法治观念、法治精神？

陈碧：我印象深刻的电影是《不该停止的追问》，它讲述了体校毕业生王菁菁为调查姐姐自杀真相而在入职姐姐生前公司并揭开职场性骚扰黑幕的故事。在追查过程中，观众逐渐发现，姐姐自杀的悲剧并非单一施害者造成。职场高管的权力压迫、丈夫的冷漠卑劣、同事的沉默纵容、公司的制度庇护以及性别文化带来的个体耻感，共同构成对姐姐的绞杀。

本片涉及我一直在关注的性骚扰议题。众所周知，在性骚扰案件中，证据难以获取。性骚扰行为因本身的隐蔽性、突发性使得案件很难留存证据，而有的受害人也缺乏案发后的证据收集意识，比如将对方发送的文字、图片删除，使得骚扰行为的存在无法被证实。此外，性骚扰行为往往发生在私密环境中，没有监控，也缺乏第三见证，这增加了举证的难度。而性

骚扰事件受害者自身存在道德压力，她们为避免尴尬与性羞辱而不敢对质。尤其在职场，受害者面对权力更高、资源更多的另一方的性骚扰行为时，通常没有对此行为明确翻脸，导致受害者是否“反感”的主观意愿难以认定。

影片中，王菁菁在追问之路上获得了成功，这与现实中为数众多的受害者维权困境形成一种令人尴尬的错位。我们当然要对女性骚扰大声说“不”，但是，将这样的要求施加给单独的女性个体是无力、虚伪的。我们应该用法律和制度保障女性权利，重建职场的性别文化，树立对女性的平等对待。在职场，女性需要的是平等。一些女性法学家认为，职场中的性骚扰不管是是否得逞，都迫使女性再次通过他人的“性别凝视”而不是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从而使她们千辛万苦争得的平等感烟消云散。这才是性骚扰的丑恶本质。

另外，除了片中体现的职场白领、工厂里的女工、服务业中的女性以及低收入人群，这些经济上最不稳定的女人群才是最容易遭到性骚扰的群体，但社会对她们的关注少之又少。法治之光不应忽略这些失语的人群。

蒋海松：《毕正明的证明》让我印象深刻。这不是一个传统的警察卧底故事，更在法律与正义、个人与集体、犯罪与忏悔的多重张力中，探讨了正义的复杂性，但也昭示了混乱年代坚守“正道”的重要价值。

片中，从小立志成为警察的毕正明“残疾卧底”的独特设定让人深思。这不仅是戏剧创新的体现，打破了警察一贯高大全的人设，也有多重隐喻。正义需要克服多重障碍，甚至以“残缺”姿态融入黑暗，方能得以彰显，可见现实复杂性。

一些影视剧编得像网络“爽文”，主角光环所致，只需一通轻松操作，正义就轻易实现。但事实上，正义的实现是极其艰难的——如同《毕正明的证明》片名所喻，需要多重证明。毕正明需要向自己证明，一个身体残疾的人依然是合格、优秀的执法人员。这触及了法律职业者内在的信念与身份认同问题。法律也需要对外的权威宣示，这是法律的证明。

片中呈现了反派的“荣门”的江湖规矩，这也是一种亚文化中的规则，比如，“大白桃”坚持“不偷老弱”，如果遇到不守规矩的同行，她会把钱还回去。但这种亚文化规

则并不能替代法律，只是灰色地带中的隐性秩序，不因此否定“荣门”犯罪本质。最终，“荣门”被铲除，法律力量以压倒性的姿态扫清江湖规矩，象征着在国家法治面前，任何凌驾或平行于法律的“江湖秩序”都不具有正当性。

张建伟：当代法律价值体现为秩序、自由、公平和效率等几个方面。法治题材电影作品和罪案片，主要基于秩序被打破（如刑事案件发生），国家专门机关或者作为被害者近亲属的个人等努力探寻真相，找出犯罪嫌疑人并将其绳之以法，从而使被破坏的秩序得以修复。这类作品都会揭示一个基本道理，即犯罪行为一旦发生，无论罪犯如何掩盖，常常以失败告终。正义在绝大多数这类作品中都会实现，这是观众的期待（这些期待自会通过电影的理想结局得到满足），也是现实中大部分案件的实际情况。因此，法治题材电影和罪案片多了，会向社会持续传递一种信号，那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些作品，也体现了对证据的重视。现代法治中要追究犯罪，离不开证据的收集与应用，证据裁判原则是认定事实的一大圭臬。在法治题材电影作品和罪案片中，有不少收集和分析证据的场面，这对于提升社会的证据意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例如，2025年末上映的法庭影片《控方证人》，讲述了英国刑事法庭审理一起谋杀案的精彩故事。片中包含丰富的英国法庭审判知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辩护律师的作用、以证据建立案件事实真相并将其彻底颠覆的故事，都令人难忘。

剖析热门成因

主持人：近年来，法治题材电影成为热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建伟：大家喜欢悬疑类作品和紧张刺激的罪案故事，这类作品有着稳定的受众，他们数量庞大，可以成为票房的保证。这些电影之所以走红，还有一个大背景，即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国策下，社会的法治程度明显提高，现实中有很多法律现象和司法问题引发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许多犯罪案件得到披露，一些新型领域的犯罪和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问题也得到不少关注和讨论。这些案件与问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紧密联系。这类影片据以改编的真实案

件，本身就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将现实发生的一些真实案件改编成电影，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条捷径，这方面的司法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陈碧：近年来，确实有不少优秀的法治题材电影。在我看来，它们既是精彩的故事，又能满足观众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正义的期待。

蒋海松：近些年，法治题材电影涌现，有助于法治建设深入推进。在普法宣传可以借用的诸多艺术形式中，电影艺术以其通俗性、普及性无疑拥有最大的影响力。通过影视作品，人们可以更语境化地考察抽象法律条文的社会环境，呈现法律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有助于弘扬法律价值，培育人文精神。

寄语未来创作

主持人：对未来的法治题材电影创作，你有怎样的期待？

张建伟：目前我国法治题材电影和罪案片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其中有质量过硬的电影，也有不少作品质量有待提高。未来，我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法治题材作品不断丰富我们的视听，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中来。更重要的是，满足观众娱乐心理的同时，借助这些影片潜移默化培育社会良好、深厚的法治基础。

陈碧：我希望未来的法治电影里，能够充分挖掘和体现人性的复杂，摆脱“完美受害人”和“纯粹恶人”的刻板设定，少一些“性别凝视”和“固定套路”。如果是讲述个案，不应停留在案件的真相和审判，更要挖掘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给观众留下反思的空间。

蒋海松：我有四点具体期待。第一，法律知识普及要准确。由于把关不严，一些法律类影视剧存在大量的知识硬伤，形成了糟糕的错误引导。

第二，情节的处理上，要突出法律主题。现在一些影视剧完全偏离主题，变成了偶像剧、言情剧，这值得我们反思。

第三，要传达正确的法治观念。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法官、检察官都有非常正面的形象，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作品展现律师的正面形象。我认为，这严重贬损了法律共同体的形象，应该说也是广受诟病的。

第四，我希望有更多的现实法治题材作品出现在银幕上。现实题材比艺术想象更具有震撼力。在我看来，韩国电影界值得我们学习。《辩护人》《熔炉》《素媛》等一批韩国电影反映了真实的法律斗争，甚至推动了法律改革。中国社会蕴含了丰厚的法律富矿，我们需要直面现实，为时代而歌，也要用作品反映真实的法律之痛，呈现法律艰难的进步。

